

ZHENGFULI DE ZHUANGYI

政府力的

中国经济文明的特殊逻辑

转移



王懋林 窦秀升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政府力的转移

——中国经济文明的特殊逻辑

王懋林 窦秀升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萍 张庆杰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天

政府力的转移

——中国经济文明的特殊逻辑

王懋林 窦秀升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富达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17.625 印张 460000 字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5260-4/F · 4527 定价：3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中外学界第一部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实质上是政府力转移的经济文明史专著，也是一部系统描述中国几千年政府力作用曲线的专著。本书紧紧抓住政府力走向这条主线，通过对纷乱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事件的剖析，为人们揭示中国经济文明发展的特殊逻辑、农业文明中帝国周期率背后的成因、使中国由盛而衰的最根本问题、帝国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府力转移的必然性。政府力与市场力是促进现代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力曾经比市场力要强大得多。在农业文明时期，政府力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只是到了工业文明，政府力才不得不屈尊于与市场力平起平坐。决定政府力转移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类追求资源利用效率所使然。因为政府包办一切、统领一切，必将使社会丧失进步的动力，不可能达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本书从人类生存、延续与发展的视野，对政府力与经济自由、权责经济制度、农业文明大国工业化的特殊路径依赖、政府力转移与中国经济文明的未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经济文明，实质上就是人类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发展过程。由农业向工业的经济文明转型，正是沿着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逻辑展开的。

因政府力专权而积贫积弱，又因饱受侵略而必须借助政府强力以和平崛起，这是中国 150 年近现代经济文明史无法回避的特殊发展逻辑和无奈的两难选择。

前　　言

用市场经济经验积累、分析、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现象和规律。因为这些理论是针对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领域，而在有文明史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力一直支配着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

政府历来是经济史研究的中心，对中国来讲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尽管学界迄今尚未将政府与政府力加以区别进行研究，但是我们认为，政府力与政府是具有天然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将政府力与政府区别开来，有助于将政治与经济的分工研究进一步深化。

《政府力的转移——中国经济文明的特殊逻辑》一书，重点讨论的问题是政府力，研究政府力在中国经济文明发展中的特殊运动轨迹，目的是对中国的市场化，尤其是政府的市场化有所进言，同时对构建中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础，尽一点微薄之力。

我们无意过多着墨于政治学范畴，因而没有对政府力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对其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从经济领域转移出来，给整个经济文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系统阐述，以明晰政治与经济再分工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

本书第一章主要提出政府力对经济自由，以及政府力对经济文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第二、三章论证了中国为什么长达数千年深

陷帝国周期律之中不能自拔；第四、五、六章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特殊路径依赖；第七、八、九章主要论述政府力为什么能够转移，怎样转移，转移中遇到的阻力及经济文明发展主导力量构成的突变等问题；第十章主要论述政府力转移对中国经济文明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

本书参阅、引述了许多杰出思想者的有关论述，如果本书对中国经济文明研究有所贡献的话，应该说是这些杰出思想者的主要功绩，错误之处应由本书作者负责。为此，本书作者对本书所引述的论著、文章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这里要特别感谢韩克庆博士从社会学角度、保健云博士从经济学角度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这里要特别感谢吕萍女士、于海讯先生，正是他们的睿智、魄力，使拙作《改革后的选择——中国经济文明的历史逻辑》顺利出版，也使我们有勇气对中国经济文明的课题继续进行研究。

这里要特别感谢李克成、廖永远、李万余、苏士峰、关晓红、覃国军、贾光生、上官建新、王喜田、郭大伟、徐会举、刘安、常延魁、赵士峰、张学明、项平生、高栋平、张宏、张昌寰、杨培根、刘永祥、王国华、卢文才、李振东、卢桂军、孙兆光等先生，他们对本课题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对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批评。

感谢李书爱、杨帆女士，她们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无私的支持。

如同人们在认识问题时常常犯有“后此错误”、“合成错误”一样，本书涉及的一些判断、论述、概念、引证等，难免有许多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政府力与经济自由	1
一、中国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机遇及其丧失	4
二、政府力、经济自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	18
三、现代经济发展中政府力越权的尝试与退出	34

第二章

权贵经济制度	52
一、以非经济性垄断为核心的权贵经济制度	53
二、权贵经济制度下的政治经济“生物链”	69
三、权贵经济制度运行的体制基础	78
四、权贵经济制度运行的内在机制	93

第三章

帝国周期律	106
一、权贵经济制度必然导致王朝的衰落	107
二、帝国农业文明与政府力专制的相互依赖	125
三、用生命投票、抢夺公共产品提供权 与权贵经济制度回归	141

第四章

帝国工业化路径的排他性选择	159
一、工业经济的侵入与古老帝国无奈的选择	161
二、权贵经济制度对英美民间主导型 工业化路径的否定	171
三、权贵经济制度对日德政府主导型 工业化路径的否定	185
四、工业化对权贵经济制度的否定	201

第五章

农业文明大国工业化的特殊路径依赖	217
一、权贵经济体系解体、终结与工业化 中民间经济作用的局限	219
二、准权力经济下国民政府推进的工业化	235
三、路径依赖下中国工业化对权力经济、 权威型政府的强烈需求	248

第六章

重工业化中的权力经济	274
一、权力经济的计划	276
二、权力经济的政府所有制	289
三、权力经济的运行危机	312

第七章

二元形态的权力市场经济	330
一、政府力转移基础条件的形成	331
二、中国经济文明史以来政府力的初始转移	351
三、政府力转移与二元经济形态	368

第八章

亚权贵经济因素	380
一、政府力的私有化倾向	382
二、亚权贵经济因素与趋向制度化的政府力私有化	395
三、亚权贵经济因素对政府力转移的影响及风险	417

第九章

主导中国经济文明发展力量的历史性突变	440
一、主导中国经济文明发展政策导向的历史性突变	441
二、主导中国经济文明发展主体力量 构成的历史性突变	452
三、主导中国经济文明发展社会阶层 构成的历史性突变	466

第十章

政府力转移与中国经济文明的未来	491
一、政府力转移与资源利用效率准则在中国的确立	492
二、政府力转移与中国大陆同世界现代 经济文明发展的并轨	502
三、政府力自觉转移与中国的全面进步	527

参考文献	540
后记	546

第一章

政府力与经济自由

回溯中国古代历史，有两件事情让人扼腕叹息、难抑泪水。

一件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全部档案资料被毁事件。史料记载，在郑和身故三四十年后，一向封存在兵部的《郑和出使水程》（也就是郑和七次航海出使的全部档案）突然“人间蒸发”掉了。此事发生在明宪宗朱见深（1464～1487年在位）的成化年间。明人严从简所著笔记《殊域周咨录》中谈到：

永乐二十三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西洋取宝船，不复下蕃。宣德中虽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人检。三日，终莫能得。夏秘不言。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悚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夏后果至兵部尚书。

项忠于成化四年（1468年）受命“总督军务”，后升为兵部尚书，郑和档案被毁就发生在他任职期间。兵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长，郎中是分掌各项军务的高级官员，类似司长。项忠和刘大夏二人竟能通同作弊，销毁属于国防核心机密的郑和航海档案。郑

和档案不但记录了郑和及其僚属几十年带兵编队航海的经验教训，而且必然是前人航海的积累。专家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明成祖曾命令郑和前往江苏、福建等地的造船厂打造“宝船”（不是刘大夏之流别有用心地说的“取宝船”）和其他战船。档案中一定记载了各类船只的长度、宽度及结构方法。此项至关重要，事关明、清两代海军的基本建设。二是郑和舰队的编队组成、指挥方法、通信联络、号令传达等。三是郑和所乘坐的指挥宝船（旗舰）的全部航海日记，以及其他各船的航海日记。四是郑和所部水师官兵的训练方法以及郑和本人如何谙熟航海的情形。五是每次下“西洋”前的上谕及郑和归国后的奏章。六是郑和舰队的后勤补给系统及实施方法。七是各类船只的武装配备。八是随船官兵的健康、疾病、医疗状况。由上所述，可知郑和档案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它被毁后损失的惨重。郑和舰队实际上就是明朝惟一的海军舰队。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猖獗达到顶点，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都遭到严重骚扰。倭寇竟攻占了帝国许多州县，大肆烧杀抢掠。而帝国的海军几乎等于零：“十存一二，遇警以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畏敌如虎，望风逃窜。”（娄曾泉等著《明朝史话》）如果此时由郑和创立的舰队还保留了下来，局面又将如何？刘大夏、项忠作为兵部的主要官员，竟完全看不到郑和航海在国防方面的正面效益，反而倒行逆施，销毁郑和航海档案，废弃舰队！这给帝国的海防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抗倭名将戚继光苦战十年，主要地还是靠他亲自练成的陆军取得胜利。一个大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而没有像样的海军，是国家的耻辱，是人民的灾难。有的专家甚至认为，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失败，也与郑和舰队的突然消失、中国海军自明中叶以来就一落千丈有着渊源关系。^①

二是袁崇焕被冤杀。这个明帝国的忠臣良将为他的国家浴血奋战，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誓死保卫的皇帝和人们一刀一刀地割尽全身的肉，并一片一片地、狂欢似地吃下去。从广东老家

到京城，跟随袁崇焕保家卫国的畲姓男子，冒死收拾了袁崇焕的遗骨，悄悄埋葬在自己的家中，并日夜守护，从此 17 代人，372 年没有片刻分离。^②

公元 1630 年 8 月 16 日，即崇祯三年的秋天，大明朝的最后一位杰出军事统帅袁崇焕在北京被朝廷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凌迟处死。而他死后竟蒙冤长达 100 多年之久。无疑，在中华民族 5 000 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之中，袁崇焕之死是一个最令后人感到荡气回肠、魂牵梦绕的悲剧，而置他于死地的“罪名”竟是：爱国。他因为爱国而被他拼死保卫过的人们——与他同样“爱国”的多疑无常而又刻薄寡恩的君主、嫉贤妒能而又用心险恶的臣僚合谋残忍地生吞活剥，是非理性的狂热“爱国热情”和“报复心理”害死了他！而用最无耻的蛊惑人心、众口铄金式言行杀死他的人们虽然无力对抗入侵的清军，但他们却把对清军的恐惧和仇恨都通通迁怒发泄到了曾经拯救过他们身家性命的大英雄身上，抗清大英雄反而成了清军人侵的替罪羊，他们就这样合谋杀死了他们之中惟一的能够抵御清军人侵的大英雄。明王朝在袁死后的 14 年被清王朝取而代之，每一个臣民的脑后从此都留下了一根令人耻辱的辫子。忠臣良将遭屠戮、明朝灭亡实属必然。^③此后国都屡遭灾祸，为世界之少见。对袁崇焕的死，《明史·袁崇焕列传》只是一句“遂磔崇焕于市”轻轻带过，在《明季北略》里却有这样的记录，“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啖，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袁崇焕的头颅，最后被传视九边，这个九边是笼统的说法，主要是指中国北方边境的一些军事重镇。崇祯的意思大概是要杀一儆百，但是他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从表面上看这两件事没有什么联系，只是无数历史事件中之一

二，但是它却为明朝注定了必将被异族打败的命运，也注定了中国被西方列强乃至日本打败、欺凌的悲剧。因为，第一个事件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刀两断了，自然资源的配置根本谈不上效率。第二个事件已经把最宝贵的人力资源给毁灭了。明不亡，天理难容。明王朝已经没有资格带领中国走向更高级的文明。遗憾的是，其后的清王朝比明王朝更加愚蠢，所以明朝的灭亡，使中国彻底丧失了自主进入工业文明的历史机遇，200多年后，中国被迫走上了一条成本相当高昂的非市场经济型的工业化道路，期间有无尽的屈辱和悲壮，仅抗日战争和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就失去了约7000万人的宝贵生命。

几千年来，一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府力转移）政策，中国的人力资源配置和自然资源配置总体上是在低效率状态下运行。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政府力一直在越轨越权地控制着一切，经济丧失了自由，而丧失了自由就丧失了活力，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也不可能按照其客观规律发展。

一、中国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机遇及其丧失

政府力一旦进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其发生的变异，无疑会像魔鬼那样让人类恐惧。所谓政府力，就是政府的力量，共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具有的力量；二是政府已经在发挥作用的力量。

人们总为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而称道，但是如果能够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角度审视几千年的中国，会十分汗颜。几千年的宝贵时间，在政府力无限制地控制一切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徘徊在农业文明坚硬的外壳里，做农业文明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设想，假如人类没有进入工业文明，还是在农业文明中徘徊将是何种景况。再假如对地球构成威胁者给人类的时间是固定的，农业文明中的人类的出路就只有一条，那就是灭亡。

换个角度，我们会看到中国人的无穷智慧，在政府力严格控制经济、社会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产生如此的进步，不能不令世人惊叹。

(一) 政府力收缩为中国率先进入工业文明创造的机遇

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竞争的政治带来政府力对经济控制的减少，政府力对经济控制的减少，意味着经济自由发展的空间扩大，经济自由发展的空间扩大，将为经济带来活力，经济活力带来经济的发展，经济自由和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逻辑。

1. 中国历史上政府力第一次大面积收缩

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带着逃离出来的周人，在今天的河南洛阳建立首都，东周王朝开始。从东周建立到秦国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共计 550 年。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力收缩，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征战不休的背后，就是政府力收缩的社会浪潮。秦王朝统一天下，为 500 多年的政府力收缩画上了句号。

周王朝的经济制度是政府所有制经济制度。周王是这个政府的总代表，直接管理中央政府。诸侯则代表地方政府。从土地所有权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国土地的惟一所有者。周王再将土地分封给亲属和功臣，令其为诸侯，按级别占有土地。王室直接管辖之地，只是其中一部分。政府公有制，本质上就是国王和贵族的所有制。“公” = “政府”。

西周的经济绝大部分是由政府力来组织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杨鹏认为，从农业生产管理来看，西周实行井田制，相当于集体公社。所谓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成不同生产单位，由贵族派官吏直接指挥，组织社会进行集体生产，产出由贵族（政府）和“社员”

按一定比例分成。这就是一种叫做“彻”的集体生产和分成制度。不仅土地归政府所有，就是劳动生产工具，也归政府控制。“社员们”集中到田头开始干活前，要由农官分发工具。土地属于政府，绝对不准买卖，所谓“田里不鬻”。从手工业来看，没有私营工商业主，只有官营手工业。物品的交换，也由贵族和官吏统一控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工商食官”，即工商业者吃的是政府的饭。从教育来看，没有私立学校，教育由贵族控制，只有政府才能开办学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就算是贵族们想开办学校，没有周王的批准是不行的。在周朝的制度下，没有自耕农、没有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一切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都在国王、贵族和贵族官吏的直接计划控制之下。^④

周朝这种政府所有和经营经济的模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崩溃。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们较普遍的结论是：铁器开始普及。为什么铁器普及，就造成集体公社的崩溃呢？春秋以前，仍属于青铜时代，那时的青铜仍然贵重，只是用于制造贵重的祭器或武器。农业生产所用的工具，仍主要是木制工具。个人能掌握的生产工具太落后，生产率太低，抵御灾害、开发自然的力量太弱，只有集体劳动才可能生存。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离开了公社集体，很难活下去。但铁器一普及，个体生产力直线提高，单个家庭就是离开了群体，也能活下来。集体性经济的现实必要性减弱了，其低效率的一面反而体现了出来。对个体技术能力与个体自由的关系，今天的学术界没能认真研究，但当时的逃奴们是十分明白的。人口多了，生活紧张了，能干的人就不愿意在集体公社中受贵族和农官们剥削，不愿再和懒汉们一起混日子了。他们为更好的收入而逃走，为更高的效率而逃走，为自由生产而逃走，公田荒芜了，自耕农渐渐产生了。

但是，历史学家往往忽略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周王朝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一是周边的楚越秦等蛮夷地区，二是开明的贵族。逃奴们带上铁制农具（“国有资产”私有化行为）和家人，从集体公社逃出去，找到合适的地方去开垦私田。那时候人少，公

有的荒地四处都是，只要逃出原来贵族的控制范围，就自由了。周边的楚越秦等蛮夷地区，正好是人少地多，他们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们逃跑过来，比如几年不上税。越来越多的人逃亡了，原来的公田荒芜了。面对这一情况，开明贵族们开始改革，他们先把公田进行承包，然后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最后不管土地是姓公还是姓私，一律开始按亩收税。政府土地所有制开始事实上的解体，契税和契约关系开始建立，政府力大面积收缩，这就是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核心。

伴随这一现象的是，周王朝中央政府力衰老，地方政府力的壮大。

各地方政府——诸侯国开始做强，展开了血腥的政治竞争。为了增强本诸侯国的竞争力，政府力纷纷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即后人所称的改革。比如商鞅在秦国，实行了全面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私有化，自由买卖。交粮食布帛，可以按标准换取贵族头衔，许多奴隶和平民玩了命地干活，改变了低下的身份，变成了新贵族。因此，秦国经济实力大增，秦军成了虎狼之师，其他国家的军队成了肥羊。商鞅改革激发了秦国的活力，秦就这样统一了天下。

2. 假如政府力再后退半步

一定限度的经济自由使原始市场经济因素的出现有了可能性。有人乐观又不无遗憾地指出，哪怕政府力再后退半步，这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变为现实。

春秋战国时期，政府力的收缩使经济得到了一定限度的自由，这一定限度的经济自由不仅使经济得到了发展，也使原始市场经济萌芽的出现有了可能性。而欧洲在16世纪才出现原始市场经济。

通过资料，我们了解到，西周实行大封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国语》），是典型的封建领主经济。庶人、工商、皂隶有一定的劳动收入；这些收入完全归他们所有，形成了以生活资料为全部内容的家庭经济。他